

中华学人丛书



王云五评传

◎ 郭太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学人丛书

王云五评传

◎ 郭太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云五评传 / 郭太凤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16296-3

I. ①王… II. ①郭… III. ①王云五(1888~1979) — 评传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943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WANGYUNWU PINGZHU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60 mm × 230 mm

印张: 30.25

字数: 405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5.00 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刘松弢 谭徐锋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作者自序

王云五三个字，在我的记忆中从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8岁那年，在我父母的书房“白雁楼”里乱翻书，发现一本四角号码词典，出于好奇，对照胡适编写的检字口诀，强记了一些主要的笔画和符号，不到2小时便大致学会了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从那时起，初识了王云五的姓名，知道他是这种便捷的检字法的发明人，觉得他的脑袋特别灵，缠着我的父母提问，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他们讲了王云五的不少逸闻趣事，但从不回答“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类的问题，使年龄尚很幼小的我，隐隐感到，王云五在“很了不起”的背后，还有一团神秘的迷雾。

在写本书之前，我花了几个星期，浏览了关于王云五数百万字的材料，觉得中国台湾方面赞颂他的纪念文章很多，少数文章则贬得过分；祖国大陆方面尽管有些文章提到过他，但往往是在不可省却时才提到的，评价大多偏低。看过资料后，对王云五的经历和功过是非，心里有了底，产生一种还王云五以本来面目的写作冲动。

王云五对中国近代文化出版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除了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他还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曾被众多图书馆采用，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然而，这两项发明与王云五在出版事业中取得的成就相比，则处于次要地位。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进过学校大门的人，几乎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主持商务出版大计的人，是

出版家王云五。他统领商务编辑工作和总理馆务达 25 年之久，一直在国内出版界保持一骑绝尘的领先地位，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将商务事业推向鼎盛，1934—1936 年三年中，商务版新书的数量占全国新版图书总量的 48%，其中 1936 年商务版新书占全国新版书 52%。商务印书馆非但雄冠国内出版业，而且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

在主持商务出版事业期间，王云五倡导出书要“激动潮流”，即多出有新意有质量的专著，注重学术性和知识含量，以此推进学术，普及健康纯正的大众文化。他认为，出书若无创意，若无助于民族文化素养的提高，则有愧于出版家的称号，也有愧于读者。他从不迎合小市民的口味而降低出书标准，拒绝出版卑俗委琐、黄色无聊的读物，也不采纳政治上趋炎附势的浅薄书稿。仅他设计并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先后出书便达 7000 余册，内容涵盖各学科知识领域。20 世纪 30 年代初，各地单位、团体因购置《万有文库》第一集而建立的图书馆有 1000 余所，约占全国图书馆的一半。今天，许多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都受过《万有文库》的滋养，至今记忆犹新。王云五主编的《大学丛书》，则填补了近代中国高等院校没有中文教科书的缺憾，将我国高等教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王云五还主持出版过其他许多影响深广的大型丛书，本著作正文中均有述评，于此不赘。简言之，在王云五通盘筹划下，商务出版了众多有价值的读物，在开发民智、促进教育、繁荣学术、沟通中西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等方面，实实在在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世所公认的业绩。

那时的商务印书馆，被人们称为“文化界的伯乐”。一些有专长无名望的学人士子，其作品一经商务发表，便“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其才识也得到同行的认可。许多新中国成立后肩负过重任的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当年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论著，或做过编辑。王云五坚持用稿看质量，用人重才识，在扶持众多年轻

学人专家的同时，他本人也成为近代中国出版业一个方面军的领军人物。

王云五既是出版家，也是改革家。他远渡重洋，深入考察国外企业科学管理经验，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法，实施全方位的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他还应邀到许多大学、机关、团体作演讲，推广科学管理法，并撰写有关论著。就近代科学管理法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沿革而言，无论理论传播还是实践运用，王云五都堪称先驱人物之一。

王云五还数度挽救商务事业。商务总馆厂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日机炸毁。抗日战争时期，商务印书馆40余家馆厂大多沦于敌手。王云五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在逆境中奋争不息，商务事业屡屡从困境中复苏，他因此被知识界誉称为“爱国出版家”。

抗战时期，王云五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开始参与高层的议政活动。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兴趣。此后，国民党蒋介石决意起用少数“社会贤达”，以掩盖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这同王云五当大官以“荣宗耀祖”的思想暗合。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王云五在南京政府做过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府委员、财政部长。在两年半的从政经历留下了几处败笔，最大的败笔便是奉蒋介石之命筹划“币制改革”，草拟了整套方案，1948年的金圆券风潮祸及整个国统区，但很少有人知道，始作俑者居然是文化名人王云五。1954—1963年，王云五先后出任台湾当局“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犹如任人摆弄的政治花瓶，插花人是国民党，他本人权力有限，政绩自然乏善可陈。

1964年，退出政坛的王云五担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仿佛倦鸟归林，恢复了勃勃生机。经由他整治革新，台湾“商务印书馆”很快就扫尽了挣扎求存的病态，先是大量重印1949年以前的

商务版书籍，继而推出各类新编的知识性文化读物，特别注重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意义不仅在于重振台湾商务事业，而且对于台湾同胞走出“文化沙漠”，深切认同中华文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台湾，王云五有“博士之父”之称，因为台湾设置博士学位，由他首先倡导，他本人又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文化名人，王云五在台湾文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除了经营台湾“商务印书馆”和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之外，他还有七八项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兼职，均勉力主持，取得较为显著的成就。

此外，王云五本人又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者，他一生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出版著译90余种。他晚年撰写的学术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各有200余万字，构思颇有特色。他最有价值的著作是《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各有100余万字。这两部长篇巨著，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商务印书馆和中国近代出版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从侧面多层次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嬗变历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与学术的价值。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得到过多位前辈人物的鼓励，聆听了他们的教诲，受益匪浅。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提醒道，文字不要花俏，分寸感要强，评论止于适可。华师大林炯如教授意味深长地说，写传记的人，容易写出感情，被传主牵住。离休干部朱宗尧先生的谆谆教导是，王云五是文化大名人，不幸误入政治歧途，多写些文化方面的业绩，政治经历不妨淡化些。在京离休干部韩子恪先生与我仅有一面之交，也托友人特地关照，王云五后半生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写传记不能回避这一点，但务必慎思。前辈们的关爱之心，我是深深领受的，于此表示感谢。他们的关照和叮咛，也反映出王云五这个人物具有多重性，选材议论都有难度，这或许是大陆迄今未见其传的一个原因。

尽管王云五是复杂而又敏感的人物，但不展示他的各个层面，便无从刻画出立体的形象。“刻画”不同于“描写”，重在真实。本著作在写作方法上取严谨态度，叙事论人皆言而有据，不加想象，不作推测性描述，因而人物的心理活动，缺乏依据的细节，由一点化开去的对话，诸如此类传记文学常用的描绘手法，均不采用。然而，这种“轻文重质”的写作方法，并没有使我感到施展不开。写大好人要在赞颂有致，写反派人物则妙在笑骂自如，这两种写作方法，虽易发挥文才，却是我不是很擅长的。写“亦好亦坏”的人物，需要辨析入理，在写作过程中展开思辨，这正是我喜欢的写作方法。我品评人物的原则是：政治的问题，作政治上的论析。纯学术的问题，作纯学术的评析。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则尽可能展开深入细致的辨析，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分析传主的政治观点对具体的学术活动有没有影响，有哪些影响，原因何在。

由于王云五最后30年生活在台湾，又有当大官的经历，有关他的生平资料，大多由台湾发表出版。这些台版图书资料在祖国大陆散存于少数几个图书馆和高校。本书得以较为顺利地完稿，得益于众多亲友的热诚相助。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傅德华先生，上海辞书出版社胡安权、王圣良先生，华师大图书馆印先生、龚女士，我的同事黄德良先生，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京的若干友人，从北京图书馆搜集到很有用的资料，替我复印。小女郭昭如，参与整理了部分资料，并提出了若干有见地的写作构想。内人孙孝煌女士将手稿打印成正稿。对于亲友们的大力帮助，我于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第一章	从启蒙到学贯中西	1
第二章	跨入政门半只脚	33
第三章	出任商务编译所长	65
第四章	图书统一分类法与四角号码	99
第五章	多重色彩的企业家	139
第六章	重振商务事业	179
第七章	商务出书又出人	211
第八章	八年辗转苦维持	238
第九章	从参政员到“政治花瓶”	275
第十章	在金圆券风潮中	318
第十一章	孤岛附政	354
第十二章	重操旧业生辉煌	399
第十三章	“学界奇人”的最后岁月	448

第一章 从启蒙到学贯中西

生在上海租界，祖籍广东香山，五色祥云称云五。年少聪悟，熟读儒家经典，长于作文写对子。

在旧时代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文化人，大都会记得王云五这个名字，那是因为王云五是国内赫赫有名的老牌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对于一般平头百姓，尤其是“老上海”，虽然不一定知道这个王某人是何许人，但害人匪浅的金圆券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这两个印象，恰好代表了王云五生平的两个主要方面。无论如何，这个人在历史上是应该写上一笔的。读者现在见到的这部传记，就是笔者为此所做的尝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一笔”，也不敢说是最好的“一笔”。

大凡出了名的人，其成名之前的经历总有些不同寻常之处，或顽劣不堪，或显露奇才。褒贬如何，又往往同他们成名后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很有关系。王云五是个功过掺杂的历史人物，他的复杂性，或者说两重性，使笔者觉得写他的传记，更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王云五少年时代的特色是刻苦求学，博览众书，这同他成为一代著名出版家是一脉相通的。名人成名之前的资料来源，不外乎其本人自述、日记或他人的采访、评述。王云五写过些日记，大多早已失散，他在1963—1966年曾撰写《岫庐自撰年谱》，但没有出版，其中主要材料编入125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记叙详尽，资料丰富。他的学生王寿南在他去世后撰写了《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有关王云五成名之前的资料，取自王云五《自撰年谱》与《八十自述》者为数颇多，并补充了许多可靠的资料。由于王云五

1951年去了台湾，两岸交流阻隔，他在晚清时期23年的经历已经没有什么亲友可作忆述，因而上述三种资料更显得珍贵，也是笔者叙述其少年时代的重要资料依据。

1888年7月9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日），王云五出生于上海租界。儿时用小名日祥，后来所取的正名是之瑞，派名鸿祯，别字云五，号岫庐，后来还用过出岫、龙倦飞、龙一江等笔名。“云五”之称始自他14岁那年。其时，他在上海遇到一位师叔，是晚清的候补官员，这位师叔很喜欢他，临别时提出给他取个别字，征得同意后，师叔当即挥毫，写下方寸大小的“王云五”三字，并解释取意于“日下现五色祥云”，同小名日祥词义相通。久而久之，云五由别字成为正式称呼，而日祥却反而鲜为人知了。依照旧式传记的讲法，这就是“以字行”。

王云五非但出生于上海，而且他前期的读书生涯以及最辉煌的业绩，多半也是在上海取得的，他还能说一口“正宗”的上海话，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但王云五从不以上海人自居，向来称自己是广东人，这是因为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各地来沪人士多以原籍自称，祖祖辈辈在上海的人则被称为“本地人”，略含土里土气之贬义，这同当代上海市民以“上海人”为荣，以“上海人”为洋气的观念不一样。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孙中山也是香山县人，1925年孙中山逝世，香山县易名中山县，以示纪念），故里在香山县四都的泮沙村，距县城约47里。其远祖由河南省迁至福建省，至宋代自闽南迁往广州府东莞县香山镇。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香山镇连同邻近数县滨海地区建置为香山县。县治石岐，为王氏家族移粤一世祖所居之地，至七世祖始迁东乡四字都之泮沙村。^①这一支王姓家族世代务农，族中人科举考试屡屡失败，因而王氏没有社会地位，属于不入流品的寒族。因此，王云五的家族史也没有可以作为依据的族谱，而是代代传述，只留下约略的概况。泮沙村内许、王

① 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33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二姓聚族而居。许姓科第得意，历代多出士绅官宦，在地方上很有些势力。王姓相形见绌，世代务农，直到晚清才有一人应试及格，入县学为生员，即民间所称的秀才，但是比起进士及第、当官入翰林，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王云五功成名就后，对自己能光宗耀祖是很引以为傲的。

王云五的父亲王光斌排行第四，童年时代在家乡农村度过，14岁那年随长亲赴上海觅生计，由学徒而经商，勉强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王云五出生时，他的二伯、三伯已经故世，大姐、三哥不幸夭丧。他出生那一年，他的大哥日华9岁，二哥日辉5岁，二姐文凤6岁，三姐（佚名）2岁。在王云五之后，其母梁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即四妹文杏、五妹文梅。王云五用“家无佣仆”描写那时生活的艰难情景，繁杂的家务由同样出身寒门的梁氏一手操持，可见家境确实不宽裕。他的父亲勉力从业，收入仍然有限，虽然家用十分节俭，但还是难以应付上海较高的生活费用，于是决定把家眷暂时迁回故乡。

1891年，他的父亲倾尽多年积累的余资，托亲戚在家乡觅地建屋。3岁的王云五就在这一年随父亲举家迁回原籍，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故乡。他父亲安顿好家眷后，又返抵上海供职。王云五这次乡居4年，是他在故乡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日子。他的两个哥哥在本村许秀才开设的私塾里读书。王云五6岁时，他的大哥教他读《三字经》、《千字文》，开始识字。王云五个头矮小（成年后略微超过1.5米），脑袋奇大，体质很弱，性格羞怯，不善于同陌生人交往，更不敢同他称之为“野蛮的”孩子们玩游戏，加上其母梁氏对子女管束甚严，所以他平日很少走出家门。两位兄长去私塾读书时，他更觉得孤独无聊，偶尔在家门口玩耍，有时受了顽童的欺侮，也不敢顶嘴论理，马上跑回家里避免麻烦。在《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对这4年乡居生活寥寥数笔带过。看来，那段童年生活对他的一生没有起多大的影响。据他在自述中所发的感慨，这4年仅有的收获是“乡居空气较佳，我的身体也渐强健”。

王云五7岁那年，他的父亲境况略有好转，来信要全家去沪上

团聚。于是，由大哥日华带领，全家乘帆船到香港，然后搭乘轮船前往上海。王云五一家租住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一楼一底的房屋。王云五和父母、两个姐姐合住在楼上。楼下隔成两处：一部分作为客堂，是全家公共活动的地方，吃饭、会客、看书都在这里；靠近楼梯的部分拦出一小间，作为他两个兄长的卧室。从居住的地段和居住条件看，他家那时的经济状况在上海处于中等水平。

这一年中秋节，他的父亲请了一位名叫林炽勋的教书先生，为王云五“开文蒙”，也就是举行开始读书的启蒙仪式。林先生教王云五读了一页《三字经》，接着把住他的手，写“上大人”起首的3节文字。启蒙仪式对王云五而言，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读物，他在乡居时早已由大哥教过了。按常例，开蒙后的孩童要入启蒙先生的私塾去读书。但是，林先生的私塾离王家住宅较远，进私塾又得交学费，再加上王云五的大哥“好为人师”，指点王云五识字读书颇有章法，所以开蒙后的王云五没进私塾，仍然在大哥指导下读古书。他的大哥那时在家自习四书五经，为回乡应科考作准备，自由安排的时间较充裕，而且做王云五的“家教”同他本人的复习并无冲突，起了温故知新的作用，因而他也很乐意教这位渴望读书的小弟弟。在大哥日华悉心指导下，王云五从8岁起开始读“四书”。中国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学童先学启蒙读物，流行最广的启蒙读物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进而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兼习史鉴、古文辞等，这是应付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知识。这类教本注重儒家道德说教，内容千古不变，脱离近代社会实际，也不适合学童的心理。但是，王云五还是学得有滋有味的，这是因为王云五素来敬仰大哥，手足情深，大哥的讲解细致生动，有问必答，教学双方亲密无间，配合默契。而且，他大哥注意教学顺序，先讲较为浅近生动的部分，以引起王云五的读书兴趣。私塾里教书的惯例，先教“四书”，再讲“五经”。教“四书”一般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顺序逐次进行。“五经”，通常指的是《诗经》、《尚书》、《周礼》、《周易》、《春秋》。“四书”是“五经”的基

础，“五经”是对“四书”的发挥，相对而言，“四书”的文字较为简明流畅。因而，王云五的大哥也是先教他读“四书”，但先讲浅显易解的《孟子》，使王云五开始读经书时，没有产生多数学童常有的枯燥乏味的感觉。王云五很快就熟读了《孟子》，而且思想也受到影响。王云五成名后多次提到，少年时代读《孟子》很受启发，特别欣赏其中有关仁政、民本的思想观念，认为这同他萌发革命意识、民国初年弃学从政，是息息相关的。

然而，王云五受教于大哥日华的时间并不久长。半年后，日华离开上海，回家乡应童子试，居然一考就中，以未入冠之年而搏来了个“破天荒”，这在香山王氏家族看来，是“千年等一回”的大喜事。考上生员，便意味着跻身士绅之列，在地方上可以算是显贵人物了，全家为之欢庆，宗族也由此生辉。没想到乐极生悲，日华“高中”后不到3个月，还未来得及入县学、成秀才，便患足疾夭逝于乡下。脚肿而导致死亡，实在出于意外。从科学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乡村医疗条件差，没能及时对症下药。但那时的人迷信，认为日华夭逝源于童子试的“破天荒”，王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天意突然冒出个显贵人物。王云五的父母也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尚存的两个儿子不能再走应考科举之途，不如学点实用的知识和本领，于是让15岁的日辉改习商务，白天学生意，晚阅读英文，发展方向是从事商业。这时，王云五才10岁，习商做学徒还为时过早，作为权宜之计，父母就把他送入私塾，本意是让他多识些字，打好中文基础，为今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

从在家读书到进入私塾受教育，对少年王云五的读书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这所私塾就在王家贴邻，往返便利，约有20名学生。教书的萧先生很少讲解课文，一味令学生背诵“四书”，背得不好便打手心。王云五对这种刻板僵化的教学方法极为反感，好在他原先在家里已经学过“四书”，又有超强的记忆力，一年多时间里没被打过一次手心。进私塾不久，王云五便摇头晃脑，把《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背诵了一遍，居然一字不差，颇令萧先生

惊诧。^① 临帖写楷书、作对子，是萧先生时常布置的另两项作业。萧先生对于作对子有特殊的兴趣，要求学生从五言对到十余言，直到对仗工整才满意。在不知不觉中，王云五学会了作对联，写古体诗。长大成人后，王云五诗兴一发，便写诗填词。他早年的诗词作品大多已散失。他在晚年写了很多诗作，状物细致，抒情真切，缺少的是意境与余味。这与他在这方面受过一些训练但又不深的状况是相符的。

尽管王云五在少年儿童时代接受旧学是不自觉的、被动的，有时甚至是被迫的，以致时而产生痛苦莫名的感觉。然而，旧学的根底以“四书五经”为铺垫，熟读儒家经典，实际上为他以后事业有成打下了基础。王云五自认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成为杰出的出版家，其次则是当上大官。没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在民国时期当然无法成为出版家；而他的当大官，既同出版家的声望很有关系，又离不开所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学而优则仕”和“商而优则仕”的结果。可见，少儿时代浸泡在儒家经典中，对他以后的“发迹”是有潜在影响的。他成名后，津津乐道于苦学成材，有时还为自己的“富贵相”感到得意。据他自述，他10岁那年，他家隔壁楼上住着一位粤籍少妇“三少奶”，很喜欢他，“她曾随星相家研究风鉴，看出我长大后定然能任大官、做大事，名留青史”^②。他的所谓“富贵相”，便是五短身材，圆头大脑。王云五成名后，研究他长相的“赶时髦”文章还真不少呢！

王云五主动接受新知识，也始于这一阶段。他常去离家不远的青年会，该会干事吴朗轩欣赏他的好问好学，网开一面，特许他看《万国公报》和会内藏书。后来，王云五又去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广智书局，第一次买书，购得《日本明治维新史》，读后感到很有趣味，他后来回顾道：“从此时起，我是一面在私塾读书，一面

①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0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② 王云五：《岫庐自撰年谱稿》（以下简称《自撰年谱》），见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18页。

自修经世之学。”^① 他开始在课余广泛涉猎新学，增长了见识。贯穿他一生的读书自学习惯也由此养成，使他后来从中获益匪浅。

局势动荡，家境变幻，这两重因素使王云五青少年时期的学业时续时断。1900年，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震撼北部中国。当时上海有些人把这场运动看作排外的愚民暴动，担心江南地区也将受到冲击。王云五的父亲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上海是华洋杂处之地，一旦染上排外风潮，很有可能殃及像他这样同洋商有业务联系的华商，于是赶紧安排家眷返回家乡。这一年春末初夏，王云五第二次回到家乡泮沙村。王家回乡是为了避“拳乱”，未作长期居住的打算，王云五因此没有被送进当地私塾，就读于私塾的学习生涯一度中止。但是这次回乡对他还是有所裨益的。每逢五天一次的墟市，他便跟随住在隔壁的堂房伯父去南荫墟选购些日用品。购物需要计算价钱，尽可能在预算范围内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他便向这位堂房伯父学心算和珠算，很快掌握了要领，他自述道：“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须要计算其利害得失，究竟利与害孰多，借为判断的标准。这不能不归功于此一时期的意外收获。”^② 王云五后来的经历证明了他的自述，无论经营出版，还是他自谓的“客串”政治，他都善于捕捉时机，反复权衡利害得失。精打细算，思前顾后，确实是他为人处世的一种特色。另一件他乐于时常提起的少年趣事是有决心戒烟。那时，村里同龄农家少年大多帮家里干些农副业零活，空闲时喜欢凑在一起吸烟。他们把烟叶切碎，用薄纸卷成香烟状，吞云吐雾，从中取乐。王云五为了合群交友，经不住诱惑，也尝试吸过这种自制的卷烟，被一位做塾师的叔祖撞见。这位叔祖知道他聪颖好学，对他寄予厚望，好言相劝道：“不要染上这坏习惯，吸烟不仅花钱，还要闭塞你的聪明。”王云五满脸羞红，表示一定牢记教诲，不再吸烟。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香烟。这件小事反映出，少年王云五从善向上，有羞恶之心，

^① 王云五：《岫庐自撰年谱稿》，见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27页。

^②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11页。

自制力也很强。

王云五乡居近一年，时局又变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清政府屈辱求和，天下复归于“太平”了。1901年春，王云五一家又来到上海。13岁的王云五到李姓塾师的私塾里受业。李先生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王云五对他怀有好感，读书不觉得苦累。李先生指导他读《史记菁华录》、《古文评注》、《孟子》、《左传》、《唐诗三百首》、《曾文正公家书》、《阅微草堂笔记》、《三国演义》。前4种书精读，后4种书略读。所谓略读，就是让王云五自己看书，有疑问便提出探讨。作文课上，王云五喜欢作议论文章。他的作文以思辨见长，虽然缺乏创见，还是经常得到李先生的表扬和鼓励，这使他有了自信，每逢作文课总想写出些新花样。这所私塾设在虹口青云堂，许多广东旅沪人士聚居在附近的里弄。旅居沪上的粤人大多经商，广东帮在上海商界颇具实力，地位仅次于宁波帮，知书达理的人物也不少，于是组织起若干广帮文社，增添些风雅情趣。青云堂一带的广帮文社时常挂出上联，征求下联佳作，赏给优胜者奖品。有一次，该文社挂出的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词意平直无奇，若以平庸对平庸就十分乏味了。在李先生鼓励下，王云五苦思几天，想出妙句，以“苏来奚后慰民思”作下联，取意《孟子》中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苏”的原意有草莽之意，对上联中的“菊”字，工整得体，却又于工中求变，引申出圣贤大义。这副下联一举夺魁，奖品是一套袍褂料子。这则小故事反映出少年王云五悟性很高，对古籍经典和诗词已有相当的理解力。直到晚年，他还坚信，如果父母不违其意，他是可以科场获捷，步步高升，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的。

上班偷看图书，被老板解雇。白天替父亲干活，夜间拼命读书。从半工半读到辍学自修，求学生涯一波三折。

1902年，王云五14岁那年，他的读书生涯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父亲认为，自己从14岁开始做学徒从商，经累年奋斗，到青壮年